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第一章 晚清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社会改革思想

第一节 清王朝的没落与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

一、清王朝的没落与资本主义的入侵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政治上，吏治腐败，统治集团奢侈腐化。经济上，土地兼并之风与日俱增，嘉庆年间，江浙一带的良田，十之七八为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所有。道光当政之后，此风有增无减。军事上，武备废弛，军队腐朽。在思想文化方面，嘉庆、道光年间，继续厉行康熙时代就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在对外关系上，顽固坚持闭关自守的政策，其要害是害怕人民与外国的接触会危及其统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秘密结社遍及各省，农民起义不断发生。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迅速发展。

英国是当时世界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它的巨大的商品生产能力和对外输出的欲望，驱使资产阶级不断地去寻求与扩大新的原料产地和新的商品市场。同时，近代大工业的发展，势必使其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势必加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和冲突。资产阶级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摆脱危机，加紧对外扩张、侵略。

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

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首先以罪恶的鸦片输出作为工具。由于鸦片烟毒的泛滥，走私盛行，使得本来就已经腐败的清王朝统治机器更加败坏。鸦片大量输入中国造成的另一个直接恶果，就是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银价飞涨。清王朝迫于其统治的存亡所系，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禁烟的压力下，被迫实行禁烟。英国政府于 1840 年 6 月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

战后签定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二、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

鸦片战争之后，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在社会危机和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开始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寻求挽救封建末世厄运和御侮强国的途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张务实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经世致用”之学逐渐兴起。

清王朝利用历代汉族统治阶级思想家的遗产实行专制主义统治

清王朝大力尊崇儒学，倡导尊孔读经，把程朱理学定为统治思想。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读书实践的风气为之一扫，代之而起的是考据

学和程朱理学的盛行。到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和程朱理学在文化思想界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

“经世致用”思潮的代表人物——龚自珍、林则徐、魏源

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部分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勇敢地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向占据统治地位的汉学和理学发起挑战。

“学术衰而人材坏”，“术愈精而愈无用”

应当注意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治学的目的是经世致用，“以经术为治术”。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都提出了变更法度，实行社会改革的主张。

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强调了解敌情，以便知己知彼。

第二节 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社会改革思想

一、龚自珍的更法改制主张

龚自珍(1792—1841)，字璚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曾在京做官。

《龚定庵文集》、《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政治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清王朝面临“末世”的揭露和批判；二是提出了更法、改制的社会改革思想。

(一)对封建“末世”的揭露和批判

《西域置行省议》中写道：“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簪菸草，……取诛戮，或冻馁以死；……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

吏治的腐败和黑暗：“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越有声望越会向皇帝进谄)；地益近，则媚亦益工，(地位越接近皇帝，献媚的功夫越到家)”。

帝王的专权和僵化的科举取士制度：君主专制制度使真正的人才遭受压抑摧残，而无耻利禄之徒却充斥官场。八股文和科举制度只能使士子们“疲精神耗日力于无用之学”，使“天下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锢”，成为思想呆滞学术浅薄，只会人云亦云，毫无真才实学的人。

他认为物极必反，社会郁积的问题愈多，愈久，“发之也必暴”。

(二)更法、改制的思想

“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

“一祖之法无不蔽，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奈之何不思更法？”

政治方面

主张适当限制君权，提高臣僚权力，理顺君臣关系。

废除跪拜制度

增加各级官僚俸禄，废除八股文和破格提拔人才

着眼点在于提高士大夫的地位和加重他们的权力，从而解决君主和“士”这一阶层的矛盾。

经济方面

抑制土地兼并

《农宗》提出了按宗法家族授田的土地分配办法

“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四个等级

龚自珍的上述主张对抑制豪族地主兼并土地有一定作用，但其根本思想是恢复并扩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按照等级占有土地和社会财富，使其各得其所。

其他方面

龚自珍还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主张破格选拔人材，废除八股文；主张禁烟，抵抗外国侵略者。

龚自珍：晚清时期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

龚自珍作为晚清时期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其思想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批判精神和变革精神。他在揭露社会的黑暗，抨击封建官僚体系的腐败方面，确实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他对社会的批评，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视和研究，打破了由于清王朝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思想文化界的沉寂局面，开创了晚清思想解放的风气。

梁启超 对他的评价

“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深受其刺激者也。”

“龚自珍……喜为要渺之思……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诸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药方只贩古医丹”

龚自珍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揭露和抨击社会的黑暗，吏制的腐败，主张更法、改制，目的是为了清除封建制度的弊病，改善封建统治，而不是反对和否定封建制度本身。

二、林则徐的反侵略思想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号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

林则徐一生最光辉的业绩是和禁烟、反抗外国侵略联系在一起的。他是清王朝禁烟派的实际领袖。在反侵略斗争中，他是地主阶级中坚定的抵抗派和主要的实践者。

林则徐的社会政治思想

(一)严禁鸦片，团结人民以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

林则徐上奏道光说：鸦片“迨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1838年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查禁鸦片。

1839年6月，林则徐将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当众销毁。

“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若概之绝，则觖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

积极备战，整顿海防，修筑炮台，购置西洋火炮，添造战船，日夜操练水师。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坚垒固军”、“以守为战”的正确策略。他认识到在反侵略斗争中“民心可用”。

(二)注意了解西方和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思想

开始把“经世致用”的方向从国内转向海外。

他招致一批有才干的人和留心海防事务的人才，商议洋事，“侦探夷情，查访汉奸”。又指示通事、买办、引水等和外国人直接往来的人员，随时报告洋人的动向。他招集通晓英文的翻译人才入幕，组织翻译外国出版的书籍。

林则徐探求西方知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西方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时事。二是关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主要是军事方面的知识。他组织编译了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训练军队学习使用西洋大炮。

他还积极收集西洋各式战船的图样，进行研究。在探求西方军事科学的基础上，林则徐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船舰和大炮，并加以仿造。

“补天派”的“忠臣”

其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是，他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的安危和毁誉，挺身而出，坚定地进行禁烟和反侵略斗争，是符合人民愿望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林则徐学习西方的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也有进步意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经魏源的概括和提倡，启发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导致了近代西学的传播和新学的产生。

三、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

1844年，魏源编纂了《海国图志》。这部书在当时的中国和东方都是划时代的世界史地巨著，成为东方各国了解西方的经典。

魏源的强国御侮的思想

(一)“以夷攻夷”和在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总结出的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即联合与英国有矛盾的国家，以牵制其力量，学习西方的“长技”，使中国在军事上赶上西方。

他在《海国图志》中以大量的篇幅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特别是英国的情况。魏源看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并企图加以利用的思想是可贵的，但他的认识和策略却是肤浅、幼稚的。

魏源认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魏源认为外夷之长技主要在武器装备、部队的训练管理等军事方面。

魏源提出的具体措施

第一，在广东开办造船厂和火器局，并聘请外国技师和工匠，“司造船械，并延西洋舵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

第二，“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第三，淘汰老弱闲散无用之兵，尽裁冗滥兵饷，用以提高士兵待遇。

第四，增设水师科，培养水师教官。凡能制造战舰、火轮船以及其他新式武器的人，都作科甲出身。

第五，严立船炮修造和水师训练章程。

(二)主张变革内政，提倡经世致用。

“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以实事求是功，以实功从实事”。用重视和联系社会实际的态度、方法来治学办事，救国救民。

理学是“庸儒”，“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清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俗学”。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

魏源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贡献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开眼睛看西方的第一人，魏源则是林则徐之后的集大成者。

魏源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师夷”的内容和对夷之“长技”的认识，停留在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养兵练兵之法”的低水平上和狭隘范围内。

第二章 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想

第一节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理论

一、洪秀全反清思想的形成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接受封建传统文化教育，仕途不顺，从十七岁开始，曾四次到广州参加考试，但榜上从无其名。

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认真阅读了中国传教士梁发编写的《劝世良言》。1843年，洪秀全与冯云山、洪仁玕等人创立了“拜上帝会”，利用传统的宗教斗争形式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积聚力量，等待时机举行起义。

洪秀全宣传的宗教观念与基督教义具有本质的不同。

基督教要人们安于现状、顺从、忍耐、不要反抗，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死后和来世，洪秀全则吸收其某些教义和形式，将其改造为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的思想武器。

基督教宣扬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主宰世间的独一真神，以此来掩盖现实社会生活中

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而洪秀全将上帝树立为农民利益的代表，用来否定、打倒、扫荡人世间的神仙菩萨和封建君主。

洪秀全宣传的宗教观念与基督教义具有本质的不同。

基督教宣扬世界上万国之人，在世人所论，虽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但在天上神父面前，以万国男女之人，就如其子女一般。旨在肯定世人只有拜上帝的平等和原罪的平等，而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上下等级贵贱之分仍是要维护的。洪秀全则认为人类既然都是上帝的子女，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那就根本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

洪秀全宣传的宗教观念与基督教义具有本质的不同。

基督教鼓吹保护私有财产，洪秀全则主张废除私有，实行“天下为公”，基督教劝人顺从、戒杀，洪秀全则强调的是“皇上帝”与“阎罗妖”的对立斗争，申明不准滥杀无辜，但世界所存的一切魔鬼该杀，头一个便是咸丰皇帝，号召农民起来向封建皇帝作斗争；基督教宣扬赎罪，而后可以升到天国，洪秀全却把这个虚幻的天国化为在人间“开创天国”。

洪秀全对西方的基督教义，既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一概否定，而是从农民所理解的平等要求和本人的需要出发做了扬弃。很显然，不是舶来的宗教唤起了中国农民的大革命，而是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使洪秀全采用并改造了这一外来的宗教为推翻封建王朝服务。

消极作用和局限性

以宗教意识为动力、为精神支柱的农民革命，不能也不可能找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对皇上帝的迷信与崇拜，完全抹煞了人的作用，自然会束缚群众的思想和积极性。特别是农民队伍内部集权与各派集团的分权的矛盾，一些领袖人物对天条、禁令的违反进一步引起宗教神学的动摇。

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理论

1845年至1847年洪秀全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简称《三原》）等著作，从而奠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理论基础。

“三原”的基本思想是争取政治、经济、民族和男女平等的民主主义。在“三原”中，洪秀全将封建势力一概斥之为阎罗妖，列为诛伐的对象，为了增强诛妖的合法性，他把基督教义中的平等观和反对奴役的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大同观念，农民战争的平均、平等思想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代表近代农民要求、赋予其权威和民主意志的皇上帝，并奉为独一尊神，将群众的斗争事业说成是皇上帝的事业，同时，他将现实生活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归结为严皇上帝”与“阎罗妖”之间的对立斗争。

洪秀全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封建等级制度应予废除，农民应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

洪秀全为人们描绘太平天国美好前景的同时，还为进入天国的人们制定了严格的道德规范。提出进入天国的首要，条件是正直、有高尚的道德。洪秀全参照《圣经》中的“摩西十诫”为太平天国制定了《十款天条》。

“三原”集中反映了农民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要求，代表了他们对太平理想世界的追求与向往，也反映了洪秀全的思想发展。《原道救世歌》中提出的主要是对每个人的

道德、宗教要求，但它明显受着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原道醒世训》虽然宗教色彩依然浓厚，但已经提出了把陵夺斗杀之世改造为公平正直之世的要求。《原道觉世训》则反映出洪秀全的思想大进了一步。他明确指出了地主与农民两大营垒、两种势力的对立，并且将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幻化为阎罗妖与皇上帝的对立和斗争，将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现实曲折地在宗教的说教中反映出来。

“三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首先，洪秀全非偶像、尊一神的思想在革命初期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代替多神的一神仍旧没有摆脱宗教迷信的羁绊，而任何宗教迷信都是反科学的，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以宗教意识为动力、做支柱的农民革命，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其次，“三原”所追求的平等，实质上是落后的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它对破除旧的封建等级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当面临建设新制度的任务时，平均主义往往成为起破坏作用的酵母。

三、洪秀全皇权主义思想评析

王权神化。洪秀全精心为自己编造了受命上天、救世下凡、宰治天下的神话，并且巧妙地将天上的大天堂与地上的小天堂、神与人沟通起来，以皇上帝的名义赋予自己神的品格，打扮为上帝派到人间的全权代表。

王位世袭的家天下是皇权主义的显著标志之一。太平天国实行帝王万世一系的家天下的原则，建立了一个“朕即国家”的洪氏家天下。

凡是皇权主义盛行的时代，必有繁琐的封建礼仪相伴随。太平天国也没有摆脱这个窠臼。无论是朝仪，还是服饰、舆马仪卫等王者之制，都有详细的规定。

洪秀全皇权主义思想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农民政权的封建化，不决定于思想意识，而决定于社会存在。作为自然经济基础上自发的农民起义，不可能完成超越历史条件许可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且，在农民政权和封建政权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其次，封建时代的农民阶级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农民阶级的意识从属于封建经济和政治权力。小农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独立的姿态，既不能代表自己，更不能解放自己。

再次，洪秀全的皇权主义与其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虽然出生在农民家庭，生活在农村，但他同时又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自幼接受封建教育，深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熏陶，成年后又具有求取功名利禄的强烈愿望，只是在仕途受挫之后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第二节 《天朝田亩制度》

一、《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

1853年冬，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包括社会组织、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的纲领性文献，被公认为太平天国思想的总纲。

《天朝田亩制度》最基本的思想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一切土地和财物统归天国所

有，将土地分给农民。它的最高社会理想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并且希望把“无人不饱暖”建立在“无处不均匀”的分配基础上。

《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公有原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纲领的形式，规定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和方法

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了“通天下皆一式”的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制定了严格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在社会组织上，《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以二十五家农户构成太平天国公有制经济的基层单位——两。两成为行政宗教合一、兵农合一、政治与经济合一，即工、农、兵、政、教合一的村社结构。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太平天国的各级官吏实行保举和委任相结合的制度。一般情况下，乡官由本地人保举，守土官由上级委任。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各村设教堂，作为文化教育场所和机关。

《天朝田亩制度》明确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规定，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分得相应的土地；禁止买卖婚姻；提倡一夫一妻制；禁止缠足、娼妓、买卖奴婢等。同时设立女官，建立女军，允许女子参加考试。

二、《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性与空想性

第一，《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运动发展的历史产物。它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欲耕者有田种，物资供给制等主张，既适应了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需要；也是历代农民运动思想和经验的升华，是将历代农民起义积累下来的经验加以理想化和规范化的结果。

第二，《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封建土地制度的对立面，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天朝田亩制度》集中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得到自己一块土地的要求，并且将“均田”作为制度规定下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它具有挖掉封建制度的墙脚，铲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根基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单纯农民战争的范围。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封建土地所有制不仅是封建统治的基础，而且也是西方列强维护对半殖民地统治的基础。

第三，《天朝田亩制度》所宣扬的平均主义思想及实施在客观上包含了为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开辟道路的内核。实践证明，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彻底否定必将为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第四，《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平均主义的纲领，只是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结晶，它要求在小农经济分散的个体生产上均贫富，消灭阶级，财产公有，这只能是一种空想。

以小生产和平均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农业社会主义。

圣库制度。

早期实行的圣库制度，财富的主要来源是战争中的缴获而不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产品，军内实行的平均分配并不是分配领域里的平均主义，而是不与劳动报酬相联系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将圣库制度推向社会，鼓吹人无私财，“物物归上主”，这必然触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农民平分财富的要求，针对地主阶级的剥削是革命

和正义的，但是针对商人和农民手工业者来说则是倒退和反动的。每个劳动者手中不能保留任何剩余产品，甚至连鸡鸭猪狗都要上缴国库，这与早期军中实行的圣库制度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取消了商品生产和交换

《天朝田亩制度》取消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生活资料采取了产品直接分配的形式。在每一个经济单位里，几乎要生产本单位二十五家所需的全部生活资料。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单位必然是自给自足和闭门自守的。其中居民获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与社会交换。

在破坏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同时也破坏自耕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劳动者不可能从“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规定中获得任何好处，其结果只能是普遍的贫困。

第三节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一、《资政新篇》的基本思想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著名领袖洪仁玕 1859 年主政后撰写的，是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纲领性著作。

洪仁玕(1822—1864)，字益谦，广东花县人，洪秀全的族弟。

洪仁玕总理朝政后不久就向洪秀全提出了《资政新篇》。根据太平天国面临的形势和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客观事实，主张太平天国借鉴西方，实行改革以巩固政权。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开篇阐述著作此书的用意在于“条陈款列，善辅国政，以新民德”。撰写此书的原则是“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所谓“立政”，是要建立健全政治制度，制定政纲；所谓“取资”，“其要在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而已。”

《资政新篇》分为四部分

“用人察失类”，强调“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风风类”，反对封建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提出移风易俗的改革；“法法类”，提出各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刑刑类”，提出要健全司法制度。

《资政新篇》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强调要革新政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国家。革新政治的首要任务，是要迅速扭转混乱涣散的政治，“禁朋党之弊”，明确规定任何结党营私都是削弱中央集权的行为。

为了推行新政而建立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与封建集权具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洪仁玕在规划政权革新时，强烈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色彩。他不赞成事无大小都由天王一人裁决，而要充分发挥中央行政权力的作用。他向洪秀全提出建议，凡国家重大的决策，君主不宜专断，可将议题先交干王和六部讨论，然后由天王定夺。他还提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政府官员必须接受群众的有效监督，设暗柜举报不法之官。他建议兴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邮政和新闻事业，开设报馆，使百姓可以通过报纸及时地了解中央的政令，揭露地方官员中的以权谋私、行为不轨的弊端。

《资政新篇》强调以法制国。洪仁玕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制如何，对国家的兴衰关系极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盛，原因在于“法善”，“邦法弘深”。洪仁玕在吸收中外法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要加强政治、经济、社会救济、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立法。在政治方面，强调法律要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所以要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管理和监督方面的立法，明确规定各级官吏的职责和应负的法律责任，而且要赏罚分明。他非常重视国家官吏守法、执法的重要性，强调官吏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并对贪脏枉法的“可耻之行”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经济方面，他提出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经济的发展，规定废除奴隶制，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发明权和创造权，保护保险事业的发展，保护与外人自由通商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等等。在立法的同时，洪仁玕提出法律的实行宜采用“德化于前、刑罚于后”的基本原则，反对不教而诛。

《资政新篇》对清政府的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倡导在民族自立、维护国家尊严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积极和先进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反对闭关自守，“轻污别国”，而要“与番人并雄”。在国家交往中所谓“万方来朝，四夷宾服，乃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

他认为与先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主要是从两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建立正常的通商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正当贸易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从商品交易中了解外国的工业生产情况以及产品的式样和质量；二是准许外国“技艺精巧”的技术人员来中国传授技艺，这实际是早期的技术引进的设想。

发展资本主义和巩固太平天国政权

洪仁玕介绍了欧美以及波斯、埃及、日本、印度等国盛衰荣辱的概况，赞扬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和政教法律，要借鉴西方“条陈方策”，“以资国政”。他非常强调的“邦法”和“技艺”，是要求民主与科学的萌芽。他认为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政治制度，才是中国走向富强独立的唯一通途。

《资政新篇》中提出了二十八条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建议，内容包括兴建近代工业、农业、商业、科技文教等诸方面。《资政新篇》所设计的是以近代生产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蓝图。

文化政策

《资政新篇》对封建专制、神权和旧礼教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倡革新旧的礼仪习俗，推行进步的文化政策。

《戒浮文巧言谕》

坚决反对旧的礼仪习俗，如溺死子女，吸食鸦片、修斋打醮、演淫戏、酗酒、朝拜菩萨等，并认为男人留长指甲、妇女缠足、金玉粉饰、养鸟、斗蟋蟀、打鹌鹑等都属于“骄奢之习”，伤风败俗，应当禁止。

二、《资政新篇》评析

《资政新篇》是洪仁玕根据中国社会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实践，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经验而提出的革新政治、变革文化、发展资本主义的施政纲领。

《资政新篇》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资政新篇》要求发展

资本主义的主张，无论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都是必要和进步的。

依靠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来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方案。

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从消灭私有制到承认和鼓励私人所有制的转折点，它反映了太平天国后期政治思想发展的进步趋势。

《资政新篇》的局限性

没有就中国如何采取民主政体提出任何实际的明确主张。

《资政新篇》对农民阶级强烈要求的土地问题也没有给以足够的注意，只是强调要继续施行《天朝田亩制度》，而没有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具体方案；同时又将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当务之急，结果在现实斗争中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效应。

洪仁玕对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缺乏应有的认识。

第三章 洋务派与洋务思想

第一节 洋务运动与洋务派

一、洋务运动的兴起

清政府中一部分官僚为维护封建统治所进行的一场以标榜“自强”的“练兵制器”活动和“求富”的经济活动为中心内容的“自救”活动。这部分官僚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主张采用西方国家的军事装备和工业技术，以强化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洋务运动在 19 世纪 60 年代兴起不是偶然的。

从内部原因看，洋务派兴办洋务的直接目的就是镇压农民起义。

从外部原因看，洋务运动的兴起是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结果。战争的结果使西方列强认识到，与其彻底打垮清政府，不如扶植它作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以保证它们在中国特权的实现。因此，《北京条约》一签定，西方各国的公使就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把他们当朋友看待，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它们的任何援助，包括以武力帮助清政府“剿贼”。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积极向清政府出售枪炮，装备清军，并派人教习制造、驾驶轮船、管理新式火炮。通过这场战争，清政府再次领教了西方各国的“船坚炮利”，同时也认识到外国侵略者并无取代自己的野心，而且还要“助剿发捻”，于是它们认定，只要与西方列强合作，执行“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的政策，清政府的统治就可平安无事。

洋务运动的产生也同早期学习外国长技的“师夷”思想有一定的联系。

二、洋务派代表人物

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的态度。

以奕訢等清朝贵族为首的洋务派，控制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揽一切与洋务有关的

事务，是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洋务派在地方的代表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督抚大臣。

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

60年代主要以购置西洋船炮枪械，建立近代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以充实军备和培养洋务人才等为主要内容；

70年代后，在继续充实军备和培养人才的同时，逐渐兴办工矿、轮船、电报、铁路和纺织等民用工业。此外，还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和翻译西学书籍等。

第二节 李鸿章的“自强”“求富”

一、“自强”与“求富”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僚家庭。中过举人、进士。并拜曾国藩为师。

李鸿章在洋务派中权力最大，经办的洋务最多，时间也最长，故而成为洋务派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李鸿章对清政府面临的严重危机的认识。

“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议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来有之奇业”。“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

“思欲以西法导中国利用之，以求自强”

他认为，英法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所以取胜，主要是因为拥有先进的武器，清朝的失败是由于军事的落后。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改变军制。在对清武装力量的改造和强化的过程中，李鸿章非常重视筹办海防，建设海军。

“求富”的主张

李鸿章认识到，强大的军事力量要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上，“必先富而后能强”，富是强的根本，求强就必须求富。

李鸿章办民用工业有“杜外人覬觐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的意图，这就使得为“求富”而创办的近代工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

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

“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

主张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

李鸿章在培养洋务人才、创办近代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有一定的建树。他的变通科考

的思想，对封建科举制度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后来戊戌变法中“废科举”的实现打下了基础。

二、“力保和局”的外交思想

李鸿章主张对外“和戎”、“力保和局”，来源于他对中外力量的对比和列强本性的认识。

“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鞞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

李鸿章对列强的侵略本性认识不清，他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暂时出现的中外相安这一表面现象所迷惑，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

第三节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

一、“中体西用”的思想源流

“中体西用”说是洋务派的思想纲领。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王韬：“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薛福成：“今诚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郑观应：“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

李鸿章说：“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獠狃之俗，所以郅治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偏端，有本有末，如病之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

二、“中体西用”论的二重性

张之洞(1837__1909)，直隶南皮人，出身于官僚家庭。1863年中探花，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职。

《劝学篇》产生于洋务运动行将破产、变法维新运动即将兴起之时。张之洞为了辟维新派的“邪说”，维护封建道统和纲常名教，向光绪帝进呈了《劝学篇》。重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理论上概括了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所谓“旧学”即“中学”指的是四书五经，即以孔孟之道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主义旧文化，主要是指纲常名教、封建道德。所谓“新学”即“西学”，就是他所提出的西艺与西政。西艺包括算术、绘图、矿冶、医学、物理、化学等等。西政并不包括西方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学校、地理、财政、武备、律例、通商、工业等等。

旧学为体，即旧学为立国之根本；新学为用，即新学为巩固根本的权宜手段，不得混为一谈。

“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

“三纲五常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教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在于有三纲五常。

“西学为用”，就是在确保封建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积极兴治西学，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

“近来万国辐凑，风气日开，其溺于西人之说，喜新攻异者，固当深诫。然其确有实用者，亦不能不旁收博采，以济时需。”

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中主张变法。在经济上全面学习西法进行生产，同时大谈其设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办报纸、倡农工商学。

在学习西学方面，张之洞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中具有改革倾向的开明人士，较之深闭固拒的封建顽固派要开通明智得多。

张之洞心目中所要的西学是以不触动封建社会的主要思想基础——孔孟之道为界限的。

“中体西用”论却具有兴西学和保中学的两重性，即在为封建旧学张本的同时，也为西学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第四章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思潮

第一节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

一、早期改良派的产生

中国社会中新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及其政治思想产生的客观经济基础。

刚刚产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及其政治思想产生的客观阶级基础。

一批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站在新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提出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的改良主义思想，从而形成了中国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

代表人物

冯桂芬，主要代表著作为《校邠庐抗议》。

马建忠，主要代表著作为《适可斋纪言纪行》。

薛福成，主要代表著作为《筹洋刍议》。

王韬，主要代表著作为《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等。

陈炽，主要代表著作为《庸书》。

郑观应，主要代表著作为《盛世危言》。

二、早期改良派的革新主张

早期改良派在新的历史情况下，继承并发展了地主阶级改革派谋求国家独立、强盛的爱国思想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

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洋务派“舍本图末”，“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根本不可能抵御外侮，振兴中国，使其日益富强。

敦促清朝政府自立自强、抵抗外侮、消除外患；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变革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学习西方“以工商立国”的经验和科技文化，变革中国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实现独立富强。

基本观点

(一)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中国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奋起反抗列强的外来侵略，制止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发展。

早期改良派主张要维护国家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限制、取消外国侵略者在华的种种特权。

(二)批判顽固守旧势力，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

值此民贫国弱，危机四伏的时刻，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就决不能专事复古，而必须向西方学习。

他们的基本政治主张，就是要求把变法作为摆脱民族危机的唯一出路，希望通过变法来适应世界发展变化的形势。

早期改良派认为，中国之所以惨遭列强欺凌蹂躏的经济原因就是民贫国弱，商务不昌。在早期改良派看来，商业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四民”中的士、农、工都应从属于商的需求。

关于全面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措施

第一，兴“贩运之利”，大力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他们认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促进商品流通，就要敢于和能够同外国资本主义争夺国内外市场。然而要实现这个基本条件，就离不开发达的近代交通运输工具。

第二，兴“艺植之利”，发展近代农业生产。早期改良派认为：中国要振兴商务，进行商战，就必须大力发展近代农业生产。

第三，取“制造之利”，发展近代工业生产。要大力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就必须重视“用机器殖财”，采用现代机器生产。

(三)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君民共主的议院政治。早期改良派在继承了地主阶级改革派“更法改图”主张的同时，还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他们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其根本原因在于实行君民共主的议院政治。

他们要求实行君民共主的政治主张的实质，仅仅是以承认封建君主的最高统治地位为基础，要求赋予资产阶级一些参政的机会与权利。它仍然有力地冲击了长期束缚中国人民思想的旧的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显示出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早期改良派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早期改良派的政治主张既体现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进步性，同时又表现出了其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反对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却幻想着要对侵略者实行“战胜于无形，驾驭于不兵”的政策，即企图通过适宜的外交途径来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和列强在华的种种特权的目的是。

他们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却主张要在君民共主的旗帜下继续保留清王朝的政权和皇帝。早期改良派并不能完全否定、也更不敢彻底摧毁封建制度。

他们主张引进西方资本主义进步的政治理论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但却继续坚持以“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作为自己的信条。早期改良派的思想仍然没有彻底摆脱浓重的封建思想文化的羁绊。

第二节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

一、康有为及其变法维新主张

康有为(1858—1927)，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派的政治代表，广东南海人，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

在甲午战争前的十年间，康有为在聚徒讲学的同时，还逐步形成了以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思想体系。其间，他先后写出《人类公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发动维新变法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基本政治主张是：

(一)君主立宪乃强国之制。国家的盛衰强弱决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政体是否适应于时代发展的需求。

康有为为实行君主立宪制设计了改变现行封建政体的具体方案：第一，选“议郎”，设议院”。第二，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第三，设立制度局与十二局。制度局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审议通过各种法律制度。

(二)发展工商业乃“立国之本”。康有为主张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要与之进行经济竞争。“以富国为先”，即制定“惠商劝工”的政策，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

提出了“以工立国”的纲领和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具体方案：采用机器、奖励发明、开矿筑路、办工厂、造船舶。

(三)废科举，倡新学，“养有用之才”。

主张要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就必须废除科举，广泛设立各级各类的新式学校，大力培养各行各业的技术人才。

二、康有为维新理论的思想渊源

康有为深受今文经学派“通经致用”、“微言大义”的启示，以“托古改制”为旗帜，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君主立宪的政治学说，重新解释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理论。

《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理论的代表作，其基本观点是：1. 自东汉以来被奉为经典的古文经学是刘歆为迎合王莽篡权而造的“伪经”，它阉割了孔子始作经书的真谛；2. 惟西汉时的今文经学才是孔子创作的“微言大义之真经”。这部书从学术上批判了古文经学派的陈腐教条和守旧学风；从政治上打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和“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保守思想。

《孔子改制考》

它是以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论证维新变法的继承性与合理性。其基本观点是：1. 孔子既是“创法立制”的“素王”，又是“托古改制”的鼻祖。这样就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依据。2. 阐发了“通三统”、“张三世”的社会进化历史观，论证了实现君主立宪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所谓“通三统”，即夏、商、周三代是分别“承顺天命”、独成一“统”的国家，每个新王朝都曾变革过先朝旧制，并不全部承袭旧制。所以，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充满生机的朝代、国家，都必须因时改制，根本不必“恪守祖训”，“莫可言变”。所谓“张三世”，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必然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历史阶段。康有为运用“微言大义”的传统方式，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的观点重新解释，阐发了“张三世”说，使之成为具有中国传统理论色彩的历史进化观点。

康有为政治思想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

首先，康有为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劝告”人们不要怨恨帝国主义。

其次，康有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主张还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妥协。他既主张“兴民权”，“自主自立”，但又主张保留封建政权。只是要求“君权”与“民权”并存，建立起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而已。

再次，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还陷于沉重的封建儒家理论的束缚之中。他在否定了古文经学的神圣经典地位的同时，却又奉今文经学为圣尊正统，并立孔子为教主。

康有为坚持其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观点，只承认人类社会必须缓慢而渐进地发展，而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飞跃与突变。

三、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大同书》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揭露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大同书》从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人道论出发，把整个封建社会描绘成一个黑暗的、违背人性、充满罪恶的苦难世界。

(二)初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大同书》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属于“升平世”，既肯定了它比仍处于“据乱世”的中国先进富强，又不把它当作绝对永恒的理想境界。它在大力宣扬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认为它同样应当为理想的“太平世”，即大同社会所取代。

(三)精心描绘未来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

大同思想有其局限性

首先，康有为用封建地主阶级的宿命论把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诸多苦难与罪恶，统统解释为“天涯之苦，己自胎生”，从而抹煞了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实质。

其次，康有为对封建制度下的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深感同情，也主张人民群众应该获得解放、自由与幸福。“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但他却反对通过阶级斗争、人民革命来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途径来实现。

再次，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以庸俗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他虽然天才地幻想了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实现大同理想的道路。

第三节 谭嗣同对纲常礼教的批判

一、反君主倡民权

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左翼激进分子，冲决封建罗网的勇士，戊戌政变中殉难的“六君子”之一。《仁学》。

谭嗣同把中国的“大同”、“重民”等进步的传统思想与西方的社会契约论结合起来，用以反对“君权神授”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君”则是根据社会需要和“民”的意志来决定取舍立废的。他认为，所谓“君权神授”的谬论实乃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谎言。

君主专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万恶之源。要“争平等”、“兴民权”、“诛独夫”，“废君统”，推翻这种“黑暗否塞，无复人理”的君主专制制度。他主张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应该要效法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

二、反纲常礼教的自由平等思想

他谴责纲常名教是维新变法运动的最大障碍，主张必须要废除三纲五伦、提倡平等自由。

他指出，君民关系之真谛在于“民本君末，君由民择”。人世间绝无“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道理。

谭嗣同认为，真正的父子关系原则亦为平等，“父子朋友也”。所以，封建的“父叫子亡，不得不亡”的绝对服从观念必须彻底否定。

真正平等的夫妇关系也应是“夫妇朋友也”。而“夫为妻纲”“三从四德”实乃“残暴无人理”，“禽兽不逮”之礼。

谭嗣同认为，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之中，唯有朋友关系既合乎人的自然天性，又合乎其社会理性，对人无弊而有利。

谭嗣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激进分子

谭嗣同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在深刻的社会变革大潮中，成为顺乎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势力的杰出代表。

他既批判了“忠君”观念，发出“冲决君主之网罗”的呐喊；却又虔诚地恭奉光绪是“圣恩高厚”的“圣天子”。

他既论证了“民本君末”、“君由民择”的理论，并高度赞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原则，却又把君主立宪的“君民共主”政治视为“完美”的理想和终极抉择。

他既揭露、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所造成的罪恶及其维护封建专制秩序的反动实质，却又认识不到要铲除如此“惨祸烈毒”的封建道德观，就必须首先铲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第四节 严复对西方思想的传播

一、严复的进化论与自由民主观

严复(1854—1921)，又名宗光，字又陵、几道，福建侯官人。他是第一个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学说和学术思想到中国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在他的大量译著中，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最深刻的当属《天演论》。

严复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同宇宙间万物的发展变化一样，是“虽圣人无所为力”的客观现实。任何人都无力阻碍人类社会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竞争中，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严复还特别强调“物竞天择”并不是“听天由命”的任天而治，特别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绝不是被动的自然进化。与其相反，人类社会只能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严复还宣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用以否定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独裁制度。在学术思想方面反对迷信，崇尚科学；在政治制度方面反对专制、崇尚自由，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制度。这是西学的实质与核心。

严复指出，国家的“政教学术”，即“体”与“用”是“若左右手”一样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指责洋务派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实质，是要用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割裂“体”与“用”的关系的荒唐主张。

“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严复还以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深邃见解，剖析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个人自由、自由竞争是其实质，而民主政治则是自由的产物。

二、严复政治思想的局限性

坚持庸俗进化论的观点，认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与生物进化一样，应该是“一任天

演之自然”。所以他不但没有亲自参加康、梁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反而非议这种积极主动地变革中国社会的行动未免过于激烈，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当循序渐进”，“不宜以人力强为变迁”。

严复虽然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理论，尖锐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他却始终没有把废弃封建君主，彻底地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作为直接的政治目标。严复主张中国应该继续维持“圣君贤相”秉政的政治体制，反对立即在中国“兴民权”。

严复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彻底失败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之际，就堕落成为顽固反对革命的封建复古主义者了，公开反对对自己曾大力宣传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主张复古倒退。

第五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理论

第一节 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勃兴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观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兴起于 20 世纪初，其政治观被时代赋予了特定的内容。

(一)反帝爱国观。

在中国近代社会条件下，挽救国家危亡是爱国者的中心任务。要救亡首先要解决如何认识和对待帝国主义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民主共和观。民主共和国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权观，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精华所在。

(三)反封建思想观。封建思想是专制制度的支柱。为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革命派向封建思想发起了猛烈冲击。

二、革命派同改良派的论战

革命派的主要阵地是由章太炎主编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改良派则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喉舌。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

第一，是革命还是保皇。

第二，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制。

第三，是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还是维护封建土地制度。

这场论战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首先，它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直接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其次，这场论战是革命势力同反动势力之间政治斗争的反

映。通过论战，分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加速了革命民主主义的传播，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再次，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论战中所阐发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节 孙中山的政治思想

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上李鸿章书》

1894年11月24日，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5年8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会章程。同年11月创办《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把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民族革命

民族主义的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实行民族革命。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鲜明的特点。它同民族复仇主义划清了界限；它把反民族压迫同夺取政权结合起来。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最明显的缺陷是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因而他也就无法揭示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民权主义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主要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他把西方的平等思想纳入民权主义，把“民治”思想同民权主义等同起来，把近代欧美的“代议政治”和“共和制度”奉为楷模。

第一，民权主义的中心目标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

第二，按“革命程序”实现主权在民。民权主义的目的是建立民主政治，实现主权在民。孙中山把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到颁布宪法这一革命程序分为三个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

第三，新国家的政体——五权分立。孙中山关于国家政体的主张是实现“五权宪法”。它是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权主义的具体化。所谓五权，就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外，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

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政纲中的社会革命纲领。其主要内容是用“平均地权”的办法既发展资本主义；又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不均与对立，从而达到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

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实际上是涂上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土地国有政策。把革命后增加的土地价值收归国有，即把土地所有权和地租转交国家，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

民生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首先，它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把土地问题和发展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经济纲领，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其次，它虽然主要反映了资产阶级中下层摆脱封建束缚的愿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反封建剥削的要求。

民生主义同样存在严重缺陷。第一，平均地权虽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但它首先解决的是城市的地价税，而不是农村的封建剥削。在中国，不发动农民起来解决土地问题，民主革命不可能成功。第二，在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孙中山“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只能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空想，根本无法实现。

第三节 章太炎的政治思想

一、由改良到革命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省余杭县人。出身于世袭书香门第的地主阶级家庭。

甲午战争前，他虽具有朦胧的民族主义思想，但走的基本上是封建学者的道路。甲午战争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章太炎脱离封建学者的道路，投身于正在兴起的维新运动。

这一时期，章太炎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在政治上，主张变法。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文化教育上，主张改革中国的封建教育。在外交政策上，主张联日抗欧美。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他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从此抛弃维新的幻想，走上了革命道路。

《解发辫》、《诂书》、《客帝匡谬》、《分镇匡谬》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苏报案”

《民报》主编

二、民族民主革命思

(一)民族主义思想。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内反对民族压迫。他以激烈反满而著称，但与地主阶级反满派的种族主义有本质不同。首先，章太炎把排满同挽救民族危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次，章太炎把排满与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再次，章太炎同笼统排满的种族主义划清了界限。

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民族独立。首先，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有较明确的认识。其次，章太炎愤怒谴责帝国主义的侵华罪

行。再次，章太炎主张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二)反资本主义思想。信仰改良主义时期的章太炎曾经是学习西方的热心者之一。但是，当他 1906 年再度旅居日本，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后，他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抨击者。

第一，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代议制。认为资产阶级代议制的选举方法极不合理。第二，他坚决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三)治世方案。章太炎在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治世方案。

第一，在政治上，主张“直接民权”，“以法治国”。第二，在经济上，主张“抑富强，振贫弱”。他主张“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凡露田，不亲耕者使鬻之”。“田不自耕者不得有”。他主张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

在辛亥革命的准备和进行时期，他旗帜鲜明地批驳了改良派的种种谬论，为反清革命开通道路。他在宣传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同时，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治世方案，表现了独到的眼力和可贵的探索精神。

章太炎晚年渐入颓唐，由趋时的革命派知名人士变为复古的名流。

章太炎一生由进步转向倒退，由叱咤风云到消极颓唐，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其大部分人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第六章 中国无政府主义

第一节 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由来

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早期流传

无政府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产生于 19 世纪上半叶，19 世纪下半叶广泛流行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早期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施蒂纳(1806~1856)和号称“无政府主义之父”的蒲鲁东(1809~1864)。60 年代以后，则是俄国的巴枯宁(1814—1876)和克鲁泡特金(1842—1927)。

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表现形式虽然各有其特点，但是他们都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政党，认为国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幻想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任何形式的国家，建立一个无权力、无服从、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舶来品。1903 年，在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第

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浪头。它的重点是宣传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活动。1903年5月，留日学生出版的《湖北学生界》载文对虚无党人大加赞场。6月9日，《苏报》发表的《虚无党》。就在这一年，《政艺画报》第14至16号连载了马叙伦的“二十世纪之新主义”。该文把无政府主义誉为《二十世纪之新主义》，说无政府主义是以恢复人的天然自由为宗旨的，可以一举把污秽混浊的世界变为金光琉璃的乐土。《浙江潮》第8、9期连载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此文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共产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两大潮流。这里的“极端民主主义”即指无政府主义。同年，张继还翻译出版了一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不难看出，由于反清革命的需要，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由注意于虚无党的暗杀活动而进一步转向对无政府主义内容的了解，从而掀起了一股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浪头。

1904年2月，蔡元培又开始发表白话小说《新年梦》，宣传无政府主义。

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以后，仍然不断刊载介绍和赞扬无政府主义的译文、图片。

但是，所有这一切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都是片断的和混乱的，而且他们介绍无政府主义并不就是信仰它。

真正把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信仰系统地进行研究和宣传，是在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出现无政府主义派别之后。1907年春夏，侨居在东京和巴黎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分别出现了以张继、刘师培、何震为代表的“天义派”，以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为代表的“新世纪派”。他们正式打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旗号，成为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代表。

二、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

“天义派”和“新世纪派”的出现和活动，是与20世纪初年东京和巴黎无政府主义的相当流行分不开的。

1907年，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正式分裂为两派，以片山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会，主张通过争取普选权和议会的多数来实现革命；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金曜(星期五)讲演会，则否认议会斗争，主张“直接行动”，用无政府主义的总同盟罢工和暗杀来实现革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一些原来就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中国革命党人。1903年就曾翻译过无政府主义著作的张继，很快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张继、章太炎等人和幸德秋水过从甚密。

1903年前后已接触到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1907年春同何震到日本后，也受到了克鲁泡特金和托尔斯泰观点的影响，成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同年4月，幸德秋水发表文章，提议中日革命家携手。不久何震创立“女子爱权会”，并创办《天义》半月刊作为女子爱权会的机关刊物，鼓吹要废尽天下帝王、官吏、警察、资本家，建立一个“不设政府”，“人人劳动”，“人人衣食居处均一律”的“新社会”。同年8月，刘师培和张继等人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出席成立大会者90多人。幸德秋水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发表了长篇演说，强调政府为万恶之源，号召中日两国人民共同行动，以促进无政府主

义之实行。

1908年4月,《天义》出至19期,改出《衡报》,它实际上是《天义》报的继续,二者大部分文章的执笔人都是刘师培。1908年10月,《衡报》出至第十一号时被日本政府禁止。11月,刘师培、何震夫妇回国,投靠两江总督端方。从此,“天义派”也就在中国的思想论坛上消失了。

在巴黎出现的《新世纪》派,也是受当地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1902年,张静江和李石曾以驻法大使孙宝琦随员身份来到法国后,和不少无政府主义者相来往。

《新世纪》创刊后,每周一期,专门介绍克鲁泡特金、巴枯宁、蒲鲁东等人的学说,报道无政府党的活动情况,鼓吹“颠覆一切强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还出版了《新世纪丛刊》和《新世纪杂刊》。《新世纪》于1910年5月21日停刊,共出121号。

“天义派”和“新世纪派”的形成,标志着无政府主义开始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把无政府主义当作科学的真理狂热地加以宣传。同时在宣传中又加进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从而使这两个派别的主张各具特色,其中又以“天义派”较为突出

以刘师培为主要代表的“天义派”的特点是,较多地反映了农村小生产者的思想倾向,同时对妇女问题给以特别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设计了一幅没有阶级、消失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蓝图。刘师培认为,人类有三大权,一是平等权,二是独立权,三是自由权。这三大权都属于天赋人权,其中尤以平等权最为重要。

“人类均力说”。

按照这个方案,人类社会要打破国界,重新划区。凡人口达千人以上,则区划为乡,乡是基本的自治单位。在这里,人人平等,人人劳动,各取所需,都在食堂吃大锅饭。

刘师培“人类均力说”的实质是绝对平均,它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发展。显然,这是一个空想的方案。

第二、把“运动农工”作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手段,提出了“运动农工为本位”的主张。

刘师培、何震指出,革命只有出于多数农工,才能叫“根本之革命”。张继说:“无论行何种革命,均当以劳民为基础。”

《悲佃篇》

第三、突出妇女解放问题,鼓吹“男女革命”论。

提出和重视妇女解放,这是“天义派”无政府主义独具的特色。《天义》报曾用大量篇幅揭露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所受的种种压迫,矛头所向,直指儒家学说。何震呼吁人们实行“男女革命”。她的具体主张一部分是合理的,如,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并重;教育同等;废娼等。但是,她又提倡所谓“女子复仇论”,在妇女革命问题上制造混乱。

与“天义派”比较,“新世纪派”主要是从事对外国无政府主义的介绍,其中主要是宣传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自己的“特色”不多。他们反对国粹主义,主张“尊今薄古”,“行孔丘之革命”。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鼓吹废强权,废私产,实行“大同革命”。

他们认为“无政府革命者，乃大同革命”。而要进行大同革命，就要排强权，废私产。

第二，提倡“以教育为革命”，主张通过“教育感化”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他们认为，革命效果的产生，自然需要革命思想的普及。但是，向来的政治革命，“往往革命一起，易生革命党之暴徒，始则夺权于少数强权者之手，继则互相争夺，肆为屠戮”。而“无政府之革命则不然，无政府主义者，其主要即唤起人民之公德心，注意于个人与社会之相互，而以舍弃一切权利，谋共同之幸乐。此实讲教育也，而非谈革命也。革命者，不过教育普及以后，人人抛弃其旧习惯，而改易一新生活，乃为必生之效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把教育称之为革命，亦无不可。这就是所谓的“以教育为革命”说。

第三，主张“尊今薄古”和“行孔丘之革命”。

无政府主义兴起之时，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有一小部分人存在着“复兴古学”以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国粹主义思想。“新世纪派”认为，这是几千年来儒家“尊古薄今”思想的表现，它阻碍着人们对西方“新理新学”的认识和传播。为了尊今薄古，他们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孔子。“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行孔丘革命”。

在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因而它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作用是反动的。而在中国情况略有不同，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因此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一，中国无政府主义是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对立面出现的，它对封建政治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无政府主义思潮泛起时，它的矛头所向，就直指封建政治。他们废国家、废强权的呼喊，在当时的中国，就是要废除和推翻反动的清王朝的统治。

第二，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的启蒙意义。批判封建意识形态，这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任务。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喊出，“尊今薄古”和“行孔丘革命”的口号，提出要把中国人民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对长期置于封建蒙昧之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思想的启蒙。

此外，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的刊物上，也曾片断地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和巴黎公社的一些情况，这些活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也是应该记上一笔的。第三，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所极力鼓吹的暗杀活动，应给予恰当的历史评价。早期无政府主义大肆宣传的暗杀手段，在革命党人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吴樾、刘师复、史坚如、徐锡麟、熊成基、黄负生、汪精卫等，都曾慷慨上阵，有的甚至壮烈捐躯。暗杀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却是对反动阶级的打击，也是对人民革命精神的激发。

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要废政府，但是当时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把它当作实现无政府主义的“过渡物”。他们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革命也应不断进化。而资产阶级共和国正是“实现无政府理想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认为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正与无政府主义行事相合”

第二节 五四前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

一、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

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下去，苦闷、失望、愤懑的情绪，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到处蔓延，人们更加痛恨军阀政权的独裁和专横。于是宣传要从根本上进行社会革命，破除一切强权的无政府主义，逐渐在国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更大的反响。刘师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

“师复主义”被称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

刘师复，字子麟，1884 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石歧镇。1904 年赴日留学时原名思复，后又改为师复。1912 年组织心社时废姓，通称师复。

1907 年，同盟会准备在广东潮惠发动武装起义，刘师复被派回广州担任暗杀水师提督李准的任务，不幸事败被捕。狱中经受种种刺激和磨难，思想更加倾向无政府主义。两年后，经营救出狱，“在港息影三年，专心研究巴黎《新世纪》报倡导之无政府主义，极为精进”。

1912 年 5 月，刘师复和彼岸、佩刚、扈离、天放、抱蜀、无为等人在广州发起成立晦鸣学社，“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他们大量翻印在巴黎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小册子，并先后辑印了《新世纪》丛书和《无政府主义粹言》等书，在国内广为散发。1913 年 8 月，刘师复又创办了晦鸣学社的机关刊物《晦鸣录》(后改为《民声》)，刘师复任主编，其成员有区声白、黄凌霜、郑彼岸、梁冰弦和林君复等。不久，他又与郑彼岸、莫纪彭、林直勉等，于广州东园组织了心社，并规定戒约十二条，即“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乘轿及人力车；五不用仆役；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该社“取绝对自由主义，无章程，无规则，亦无一切组织，各凭一己良心以相集合”。

晦鸣学社和心社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内成立的最早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内的活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14 年 7 月，刘师复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发表宣言。宣言明确申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在这个组织的影响下，广州的刘石心等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的杨志道等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江苏常熟的蒋爱真等成立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社”。

以刘师复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还积极与国际上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大粉荣、格拉佛等人联系，他们也纷纷来信表示支持。1914 年 8 月，刘师复代表“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致书在伦敦召开的无政府万国大会，报告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和现状，并向大会提议：(一)组织万国机关；(二)注意东亚之传播；(三)与工团党联络一致进行；(四)万国总罢工；(五)采用世界语。同时，他们还在工人中积极进行活动。

刘师复是中国信仰无政府主义最坚决的一个人，他的最大特点是言行一致。刘师复虽然早逝，但是他的门徒却把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大为扩展开来，从而在广大青年中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异常活跃，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据统计，全国无政府主义社团达到 90 多个。与此同时，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报刊书籍也大量涌现。报刊约有 70 种左右。

这个时期，无政府主义也在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大钊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赞成阶级斗争学说，但是他在 1919 年 7 月发表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仍然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看作是“确信不疑的道理”。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仍然给无政府主义一席之地，经常刊登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他自己则把“相爱互助”列为他所推崇的新社会的重要原则之一。毛泽东在回忆他第一次到北京时的思想状况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周恩来和觉悟社社员们也是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恽代英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确地宣布：“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

从客观条件来说，无政府主义在五四前后异常活跃，除了中国有着产生无政府主义的肥沃土壤等原因外；还与当时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有关，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对中国人民的刺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虽然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已传入中国，但进步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也惊醒了中国人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破产了，社会主义成了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是，在初期的社会主义潮流中，对科学社会主义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者极少，甚至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憎恨，人们“简直声言无政府主义”。

二、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和基本观点

刘师复创立了近代中国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党派和理论体系，因此，人们一般把他称作中国无政府主义政治纲领和理论的奠基人，“师复主义”也可称作中国无政府主义。

刘师复继承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其基本政治观点是：

第一，“实行共产，废除政府”，“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刘师复认为“阶级制度者，平等自由之大敌也”。他认为，要使人民获得“自由”、“幸福”，必须反对任何政府和强权，“凡为统治制度之机关，悉废绝之”。总之，他认为：“实行共产，废除政府，此诚为无政府党之根本要义”。

第二，反对宗教、迷信，废除婚姻、家庭。他的这一思想是与反对强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宗教为保护强权之利器，导人安贫守分，服从强权。所以，去迷信与去强权，二者皆革命之要点”。同时，他们还认为，正是家族的产生，导致了人们产生了私有观念，进而导致“专制政体”的出现。而婚姻制度则是酿成“家族之根源”。因此，他们把“家庭革命、圣贤革命、纲常革命”作为无政府党人思想革命的口号。第三，以“传播”、“感化”和工团主义作为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

对于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手段，刘师复也作了详尽的说明。在《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中，他设计的方案是：1. 用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传播主义于一般平民，使多数人明了主义之光明，养成“劳动”、“互助”的“美德”；2. 在传播过程中，根据形势的发展，用抗税、抗兵役、罢工、罢市、暗杀、暴动等于段，反抗强权，伸张公

理，以此激动风潮，促进主义之迅速传播；3. 俟传播成熟，众人起事，推翻政府及资本家，这就是平民大革命，而且，这种平民大革命也是世界大革命。显然，他是要首先通过“传播”、“感化”，然后通过总同盟罢工等形式实现无政府共产社会，只不过是把“传播”、“感化”看作是当时压倒一切的急务罢了。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是继承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时也加进了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内容。

刘师复死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大体上是两派。一派是无政府共产主义派。这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派别，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力。北京的“实社”和“进化社”是其主要代表。实社成立于1917年，出版不定期刊物《自由录》。1919年与“民声社”、“平社”和“群社”合并为“进化社”，出版刊物《进化》，主要成员为黄凌霜、区声白等。

另一派是无政府个人主义派。该派以“奋斗社”为代表。“奋斗社”成立于1920年，主要成员有易家钺、郭梦良、朱谦之等。他们接受的主要是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理论。施蒂纳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把个人的自我奋斗看作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宣扬除了个人以外，什么也不存在。

第三节 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瓦解

一、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应该看到，刘师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找新的救国方案的时候产生的。从理论体系上说，无政府共产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资产阶级专政，企图建立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因而是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当然，这是一种空想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中国的情况下，无政府共产主义相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说，仍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历史也已经证明，当时中国的许多先进青年正是以这股社会主义思潮为阶梯，通过反复的比较实践后，才逐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无政府共产主义对当时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启迪和引导的作用。

但是，无政府主义最根本一点是竭力反对一切国家政权，这样也就必然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相对立，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后，它就成为一股反动的思潮了。

1919年2月，黄凌霜在《进化》月刊第1卷第2号上发表《译“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中，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黄又在《新青年》6卷5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攻击。1920年2月出版的《奋斗》第2号，公开发表《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此后，《奋斗》第8、9号合刊，发表了“反对布尔扎维克专号”。

为了坚持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理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

了一场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辩论。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地以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批驳无政府主义。接着，开辟了《讨论无政府主义》专栏。1920年11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少年中国》、《先驱》、《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都展开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

在这场辩论中，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第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从反对一切强权，废除国家的观点出发，激烈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者着重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剥削阶级专政的区别；阐明了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建立革命政权的必要性。

第二，关于纪律和自由问题。

鼓吹绝对自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观点。黄凌霜公开宣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

马克思主义者则指出，在人类社会，个人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

第三，关于生产和分配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从绝对自由观出发，在生产和分配问题上也摆出了错误的主张。在生产上，他们反对任何集中，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实现没有任何权力形式的“生产自由化”。在产品的分配上，他们不顾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主张立即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马克思主义者反驳说，在社会化的大生产条件下，“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么能够使中国的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怎么能够调节生产使不至过剩或不足？怎么能够制裁各生产团体使不至互相冲突？怎么能够转变手工业为机器工业？怎么能够统一管理全国交通机关？”因此，“共产主义的原则主张把一切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关于分配问题，马克思主义者阐明了人们的分配方式和生产力的关系。

这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辩论是相当广泛的。它不仅在报刊上公开进行，而且在许多社团内部以及国外留学生中也热烈地进行着。

由于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据着优势，在广大青年中异常活跃，因此，这场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意义十分重大。它使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认清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性和反动性，从而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二、无政府主义的破产

无政府主义的破产主要表现在广大青年对其信仰的崩溃，以至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化。这种分化，大体有几种情形。

一是许多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或是朦胧中聚集在无政府主义旗帜之下的进步青年，经过识别，逐步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并非改造中国的灵丹妙药，于是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之下。另一部分人，则由无政府主义的狂热转为颓唐，遁入空门。

还有一些人则堕落为资产阶级政党和反动派的帮凶。这些人中有的本来就是投机政客，

有的则是因为个人主义恶性发展，贪图仕途功利而走上了反动道路。这些事实说明，在阶级斗争严重存在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谈梦想。无政府主义者的分化是必然的。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节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一、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最早谈到社会主义的中文出版物是香港的《华字日报》。同年，王韬与张宗良合译的《普法战纪》出版。1882年，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最早提到“康密尼党”。1899年2月至4月，基督教会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刊载了李提摩太节译的《大同学》。

以上不过是一些翻译文字，最早在中国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1902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中，尊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1903年，梁氏又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说，社会主义“最要义”是“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主义也很有兴趣。1903年2月16日，马君武在他翻译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说，“马克思者，以唯物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2、3号上发表《德意志革命家列传》。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也多次谈到社会主义。

尽管革命派和改良派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有别，但都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作考察。

第一，中国思想界宣传的社会主义，最早是经过日本引进的。日本的社会主义热潮早于中国。中国有关社会主义的宣传，几乎全部自日文翻译而来。他们既没有读过马恩的原著，又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了解，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就带有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特色。

第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都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救治社会不平等、避免“资本祸害”的、人道的、和谐的理论与社会制度，但并不同意它的实行方法。

第三，这一时期有关社会主义的介绍是零散的、片面的，对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不加区别，而且往往把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混同起来。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要有产业工人队伍作为阶级基础，二要有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作为传播者。这两个条件在辛亥革命以后逐步具备了。

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准备了社会阶级基础。

新文化运动不仅由资产阶级思想武器启了封建主义之蒙，也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

第二节 十月革命与李达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中国思想界对十月革命的最初反应

十月革命发生后的第一年，即 1917 至 1918 年，从当时影响较大的《东方杂志》（代表改良派）、《民国日报》（代表民主派）、《新青年》（代表激进民主派）三种刊物对十月革命的反映看，较早报道消息的是《民国日报》与《东方杂志》。《东方杂志》主要是转载帝国主义通讯社的消息、评论以及翻译日本人写的评论文章。孙中山是欢迎十月革命的，1918 年他被西南军阀逼迫由粤到沪，给苏俄拍了一份祝贺电。《民国日报》对十月革命的宣传也很积极。代表激进民主派的《新青年》，在 1918 年 6 月以前，对十月革命这样的世界大事，无一字反应。原因是，一则《新青年》从四卷一号（1918. 1）起由陈独秀主编改为六人轮流“执政”，主要是胡适控制了版面。从这一期起，重要文章大都是关于文学改革、文字音韵学、哲学道德等方面的内容。二则这时陈独秀的思想还集中在以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封建礼教的热点上。

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的认识，从 1918 年下半年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当时国内有两件事反响强烈：一是 1918 年 3 月上海《时报》披露了 1916 年 7 月的“日俄密约”，此密约规定沙俄承认战后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占领权移交日本。二是 1918 年 5 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以“防俄”为名，出卖我东北领土和主权。

最先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价值的是李大钊。1918 年 7 月 1 日他在《言志》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十月革命意义并对其表示成功信心的第一篇文章。紧接着他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情地、乐观地评述和歌颂了十月革命。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信念越来越坚定，宣传也更加积极。从 1919 年 1 月起，《新青年》开始实行轮流主编。陈李各主编 1 号和 5 号

李大钊为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注意，借纪念马克思诞辰 101 周年之机，将《新青年》六卷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与此同时，又帮助北京《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在当时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文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李大钊借助日文和英文，搜集各国学者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写成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连载于《新青年》六卷五、六号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关于唯物史观,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认为,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要件”。

关于阶级竞争学说。李大钊指出: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的分析,是以是否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手段)来划分的,占有土地、资本者可以剥削压迫不占有者,他们的利害是相反的。

关于政治经济学。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是“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论”),“每个物品的价值,应该纯是物品中所含人类劳工结晶的全量;物品价值的分别,全依劳动份量而异。”劳动力也是商品,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要比他所获得的报酬多得多,这多余的价值就是“余工余值”,全部被资本家剥削去了。二是“资本集中说”,资本主义企业激烈竞争,互相吞并,以大吃小,这样资本越来越集中,无产阶级也越来越壮大,成为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后力量。

尽管这篇文章有不足之处,然而它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开始传播的标志。从此,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有一大批先进分子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时代的主流。

第四节 科学社会主义思潮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一、五四后的社会主义热潮

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宣传阵地迅速扩大。五四前就宣传社会主义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晨报》、《民国日报》等进步刊物继续大量刊登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此外,五四后新出版的四百余种报刊,也几乎无一不谈社会主义。同时,各地还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学社、书社等团体。

宣传社会主义热潮在中国的出现,有两个客观因素。一是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的丑恶表演,使中国思想界对帝国主义丧失了信心;二是十月革命的榜样特别是苏俄政府对华通告,使中国进步分子受到鼓舞。

中国知识分子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把它同中国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联系起来。综观这一时期的刊物和团体议论的内容和组织活动,他们提出的主张大都认为中国社会黑暗,必须改造,并且不能小改,“任何改革,必须求根本的解决”。他们提出的社会改造方案中,几乎都带上社会主义色彩。

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概念,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其中的一派,而且,起初并非是占主导地位的。此外,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几乎都被当作社会主义来接受。

当时各种流派,大致如下:

资产阶级民主派。孙中山代表的左翼同情社会主义,但空想成分较多。认为三民主义更适合于中国,企图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不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右翼也宣传社会主义,但坚持阶级调合论,企图控制工人运动,

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改良派。研究系梁启超、张东荪等推崇罗素贩卖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胡适则鼓吹杜威的实用主义，也主张社会改良主义。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主要有：

无政府主义。以互助论为基础，主张废绝一切私有财产，废除一切军队和政府权力。主张绝对自由。

新村主义。受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和日本“新村运动”影响，主张脱离现实不合理社会，另立一个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

合作主义。通过组织合作社，用和平方法消除剥削和压迫，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

泛劳动主义。学习俄国托尔斯泰“身为贵族，躬耕田间”幻想通过教育手段，使人人劳动，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

工读主义。以互助论为理论基础，主张劳心劳力，工读结合，实行“小团体，大联合”，团体内“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以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带有空想、改良色彩的居多，最激烈的是无政府主义派。因为中国落后的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工人阶级的数量小，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占主要地位。小生产经济关系使人们习惯于把个人命运同现实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习惯于点滴的、渐进的改良，十分热衷于通过互助互爱建立和平的新社会。尤其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热浪翻滚却又真假难分，人们一时划不清空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处于既急于求中国社会现状的改变，又想避免激剧破坏，力求用温和稳妥的方法改造。这种矛盾心理状态，是造成改良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一度在中国流行的重要原因。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明显的分化。资产阶级改良派、无政府主义派、资产阶级民主派一部分右翼等，都相继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

1919至1922年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队伍。

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学说从日本、法国、苏俄三条主要渠道传入中国。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主要从日本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周恩来、蔡和森等五四前后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欧洲有机会直接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原著，观察工人运动现状。瞿秋白、张太雷等则是通过赴俄考察，出席会议，最早亲自目睹了革命后苏俄的状况，从而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等，则是在参加国内实际斗争的基础上，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在五四时期，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同情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然而其中只有一部分人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其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差别。这种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态度不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宣传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改良主义。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则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挽救中国的武器，学习与应用并重，“革新”与“革心”并举，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

自己。

第二，对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态度不同。五四时期，除了反动统治者和封建顽固派，知识分子普遍同情劳苦大众，同声呼喊“劳工神圣”。但真正关心工人阶级利益，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并且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者，只是树立了对共产主义信仰的人。

第四节 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的论争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最先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名，企图以实用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等立即予以反驳，于是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的论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以反对空谈主义为名，抵制马克思主义宣传。二是打着“多研究些问题”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

李大钊反驳胡适时指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主义，李大钊强调了主义的理想与实用两面，主义指导问题。李大钊以俄国革命为例，说明点滴改良不可能使社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而要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必须展开阶级斗争，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

1919年8月底，《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查封，“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阵地移到了《新青年》杂志。12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企图把新文化运动限制在学术研究范围内。接着，李大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一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深刻的经济根源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必要性。

二、社会主义论战

1920年10月，张东荪陪罗素到湖南讲演，回到上海，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向科学社会主义挑战，引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的研究系，原是清末君主立宪派，五四后主办《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报刊，以研究社会主义为名，宣扬唯心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张东荪的挑战书以及梁启超的《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新青年》及其它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驳斥研究系，陈独秀还将双方言论集中起来，开辟“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

论战主要围绕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阶级斗争，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展开。

第一，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张东荪等人认为中国贫乏之极，大多数人过着不是人的生活，为了让中国人过上人的生活，谈社会主义，多数派主义都是没用的，只有依靠绅商阶级发展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张东荪等将社会主义与解决中国贫穷问题分割开来的荒唐无理，又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揭穿了他们所设想的资本主义生活的美丽前景。

研究系分子幻想依靠中国资产阶级反帝反军阀，建立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和军阀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前山老虎和后山老虎”。处在封建势力与殖民势

力压迫下的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这决定了它性格的软弱性。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只有顺应这一趋势，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劳资协调还是阶级斗争？

在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上，研究系分子歪曲中国社会阶级关系，主张阶级调和。他们反对农民革命，主张在现有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稍加改良。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用大量工人悲惨生活与农民冻饿至死的事实驳斥了张东荪等人的谬论，批判了他们为地主、资本家掩盖罪行的错误，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农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势不两立的关系。主张通过阶级斗争，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第三，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在社会主义辩论中，讨论了要不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研究系分子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认为中国没有无产阶级，或人数很少，质量低，没有建立政党的条件。

这次论战持续了一年多，规模和影响超过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使人们初步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界限，论证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采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改造中国。

第九章 国家主义派、“联省自治”和“好政府”主义

第一节 国家主义派的政治思想

一、国家主义派的产生

国家主义派，是20年代由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一些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政客组成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接受了欧洲国家主义的观点，鼓吹“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民族优胜”等法西斯主义观点，并以所谓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幌子，疯狂地进行反共，反苏活动。

国家主义派的骨干分子曾琦、李璜、余家菊等，原是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右翼会员，当时就接受了国家主义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此后，这些人先后赴欧洲留学，进一步接受了国家主义。

1923年12月2日，由曾琦、李璜等发起，共52人在巴黎玫瑰城共和街餐厅中集会，正式建立了“中国青年党”，曾琦被推选为委员长，并以《先声》周刊作为该党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党的建立，标志着国家主义派正式形成。该党成立后，对外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出现，最初的活动主要在法国。

1924年9月，曾琦、李璜回到上海，将青年党的活动中心转到国内，总部设在上海。此后，又创办了由曾琦任总编辑的《醒狮》周刊(故又被称为醒狮派)和一些地方刊物，积极吸收国内的国家主义派分子入党，发展地方组织，先后在十几个省市建立省市党部和三十多个国家主义派团体。

1925年12月15日，又成立了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以及北京、南京、武汉三个分会。国家主义派的主要成员都有一些著述，其中李璜的《释国家主义》是国家主义的代表作。

二、国家主义派的政治主张

第一、宣扬资产阶级国家观，鼓吹所谓“全民革命”，反对阶级斗争。

国家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抽掉“国家”阶级内容的，抽象的资产阶级“全民国家”观和“国家至上”论。

从这种抽象的资产阶级国家观出发，国家主义派反对阶级斗争学说，鼓吹所谓的“全民革命”。国家主义派的“全民革命”、“全民政治”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阶级调和宣扬超阶级的“国家利益”的代名词。

第二，盗用五四时期“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疯狂反共、反苏。

“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是国家主义派最基本的政纲和口号。国家主义派的“内除国贼”，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

国家主义派不仅不反对真正的国贼——军阀，而且与军阀为伍，卖身投靠。

国家主义派的“外抗强权”，实则是反苏的代名词。他们诬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把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说成是侵略，把接受这种援助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骂为“苏俄走狗”，然而对真正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他们却为之辩护。

三、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国家主义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是“社会名流”、“教授”，他们又打着“民族”、“爱国”的旗号，因此，国家主义一度在知识界有一定影响。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响导》和《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开展了对国家主义的批判。

第一，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批判醒狮派的反动国家观。共产党人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从来就没有抽象的国家，全民的国家。

第二、共产党人还批判了国家主义派鼓吹“全民革命”，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

第二节 “联省自治”思潮

一、“联省自治”思潮的出现

“联省自治”是20年代初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一些地方军阀和以胡适、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鼓吹的“省自治”、“联省自治”曾风行一时，并对中国政局产生过颇大的影响。

“联省自治”思潮的风行一时，直接和当时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不断争夺、混战的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48100126042006036>